

## 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说辨误

石 泉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对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这一流行说法的历史文献依据进行辨析。其一,今本《左传》昭公三年下有一条注文: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被看作西晋初年杜预的权威性注释,但同为杜预所作的姊妹篇《春秋释例》却无此内容。北魏郦道元、唐初孔颖达都尊奉杜预,多次引用杜著二书。如果杜注中原有此条,他们解释古云梦泽时岂能不直接引证?可见,流行说法实应出自孔颖达的推论(孔《疏》语气亦可证),而为后人属入杜注。其二,孔颖达以为“江”专指长江(实则古之沂水、淮水、江水、沮水皆有“江”称),认为《左传》“江南之梦”(“江南”为地区名,“梦”通指泽藪及水草地)与“济江”后所入之“云中”(实为汉东的郢国故地)都是指长江南岸的云梦泽,进而推断“江北亦有梦”,“此泽跨江南北”,实皆误。

现今流行的《左传》各种版本在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句下,都有以下一条注文:“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一句注文一直被认为是西晋初年杜预的注释,是最早的一句解释古“云梦”范围的权威性古注。早在北宋时期沈括写《梦溪笔谈》时所见的《左传》中就已把这一条归入杜注。<sup>①</sup>历来被后世学者所遵奉,成为“跨江南北”大云梦说的最基本依据之一。

但是,这一说法是不可信的。蔡述明先生早在1980年即已根据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大量石油钻探所得的地层材料,加以分析,从地理地貌学角度对此说提出了异议,认为第四纪以来就不存在跨长江南北的古云梦泽。<sup>②</sup>但他的这一新见解曾受到某些熟习中国古文献材料的专家们质疑,认为古代直至清人的一贯记载与解释都说云梦泽“跨江南北”,面积很大,甚至包括整个江汉——洞庭平原四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如欲否定“跨江”之说,将如何解释这些传统论述所依据的大量前人记载?

本文目的就在于配合蔡文,试图从古文献记载入手,进行必要的考订,返本探源,对古云梦“跨江南北”之说的由来,试作探索,以明究竟。通过文献材料的核实存真,对蔡文作出补充性论证,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消除一些障碍,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首先,必须辨明:“古之云梦,跨江南北”之说是否确是杜预原注?我们从以下三点进行考察之后,不能不产生疑问:

(一)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或“杜注”)和《春秋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同出一源,同释一书,其于地名方位之阐释,彼此大都相同,而《释例》往往稍详。可是,值得我们注

意的是：“古之云梦，跨江南北”这样一条提得如此简要、明确而又突出的注文，却在《释例》中竟无一语提及。《释例·土地名》（卷6）“楚地”部分，于同一年（昭三年）之下，也有“江南之梦、云中”条，内容则为：

“南郡枝江县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东南亦有云梦城。或曰：南郡华容县东南〔亦〕有〔云梦〕<sup>⑧</sup>。巴丘湖，江南之梦也。”

这里只提到两个云梦，分在二郡之两个县境；另指出：有人认为“江南之梦”即是华容云梦泽，又名巴丘湖，却还只作为有此一说的“或曰”，这同“古之云梦，跨江南北”那样明白肯定的语气，怎能合得上？

（二）《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对杜预是很尊奉的，全书中多次引用杜注及《释例·土地名》（有时亦称《春秋释地》）的记载达百余条之多。其《夏水篇》（卷32）综述当时“云梦之藪”涉及的城邑地区，并引杜预所云：“枝江县、安陆县有云梦”一条<sup>⑨</sup>；也谈到《左传》所记“江南之梦”，云即郭景纯（即郭璞，东晋人）所言“华容县东南，巴丘湖”<sup>⑩</sup>，而独未引录“跨江”之说。《夏水篇》描述云梦泽范围，包括当时七县之地，形成“跨川亘显，兼包势广”的地理景观。这也是现存古记载中最早的“大云梦泽”说，却也只跨汉水，位于长江以北，亦无“跨江”的迹象。据此，亦可推知郦道元所见之杜注中，似尚无“云梦跨江”之文。

（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以下简称“孔疏”）亦对杜预极为尊崇<sup>⑪</sup>。“孔疏”之于杜注，一般只作补充、阐发，绝少异议，并多处征引《释例》为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孔疏在《左传》定公四年记楚昭王君臣自郢奔随过程中，“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句后，首先全引《春秋释例·土地名》昭三年“江南之梦、云中”条的原文（已见前引），然后加以论证云：

“郢都在江北、睢东。王走，西涉睢，又南，济江，乃入于云中，知此在江南。昭三年，王与郑伯田于江南之梦，谓此也。言江南之梦，则江北亦有梦矣。司马相如《子虚赋》云：‘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则此泽跨江南北。”

这一段中涉及的其他问题，将于后文再作论辨。这里先指出一点，即“孔疏”这一段的主要目的是论证古云梦乃“跨江南北”，开头先引用了上述杜预《释例》中有关云梦的记载（却又是并不足以确证古云梦“跨江”）材料。而对于那句直截了当、简单明确的“古之云梦，跨江南北”注文，却未被引用，这又该如何解释？

联系孔颖达《尚书正义》（卷6）禹贡篇“云土梦作孚”句下的另一段疏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这段“孔疏”首先引《左传》昭公三年关于“江南之梦”的记载，继之引《汉书·地理志》关于南郡华容县南有云梦泽的记载，然后又着重引了前述杜预《释例》那一段，其下也引了司马相如《子虚赋》称云梦方八九里的话，最后推证出：“则此泽跨江南北，每处名存焉”。如此多方引证前人的记述，以充实其论据，却独独未引用“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条最直接的有力论据。如果杜预确有此注，孔疏将求之不得，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岂能反而弃置不顾？我们仔细审读上述两段着重论证云梦“跨江南北”的孔疏，可以看出其语气之间全未将此说归本于杜注，而是作为一己的创见提出的。依孔颖达的学风，当不致公然掠美（特别是对杜注），据为己有。由此亦可推知：孔颖达所见的杜注原文中，似尚无云梦“跨江南北”之文，因而孔氏把此说作为自己的创见，也就可以理解了。

据上所考，似可认定：今存古记载中最早明确提出古云梦“跨江南北”之说的实非杜预，而应是晚于杜预三百年的唐初权威经学家孔颖达。但这一“创见”实际上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下文将从几方面加以探究。而这里又需先指出：今本《左传》中还有两句，一向也被认为是杜注而实际不然的注文，需要于此同时辨明，才能更好地澄清问题。其一是在记楚昭王自郢出奔“涉

睢”句下，杜注阐述睢水源流之后，还有一句“是楚王西走”；其二是在下文“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句下，杜注“入云梦泽中”后面还有一句“所谓江南之梦”。这两句都在定公四年两处真杜注的末尾，成为顺带的附加物。后文将于剖析孔疏论证之误时，结合起来，作出揭示。

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孔疏的问题所在：

(1)孔疏论点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以“江南”之“江”为今之长江，据以断定“江南之梦”必在长江以南。泉按：古文献中之“江”，未必皆专指长江。拙作《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已有考<sup>①</sup>，举出了近二十例以证：古“四渎”之“江”（汉宣帝以前）当为今鲁东南之沂河而非长江；淮水、汉水以至古沮（睢）水（今宜城平原之蛮河）<sup>②</sup>在古文献记载中皆有“江”称。故未可因“江南之梦”有“江”字，即断定其必在长江以南。关于“江南之梦”的地望，当依杜预《释例》及《水经注·夏水篇》所记（皆已见上引）与华容云梦泽（巴丘湖）相结合，统一解决。简括地说一句：“江南之梦”的“江”并不是今之长江，而应是指古沮（睢）水（今蛮河）下游。“江南之梦”（实即华容云梦泽、巴丘湖）乃应在今钟祥县西北境、汉水以西、荆河以北地带。这是另一个牵涉颇广的复杂课题，将于另文《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巴丘湖、江南之梦）故址新探》中详考，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2)孔疏由于误以《左传》中之“江”皆指今长江，同时又深信古郢都必在长江边今江陵县北，（二者之间，又被“江”联系在一起），于是就认定《左传》所记“云中”亦必在江南。加之《史记·楚世家》（卷40）记楚王出奔后的行程与遭遇也大致相符（但更简略），可以互证。只是《左传》所记“云中”在《史记》中作“云梦”。另外，杜预注“入于云中”，亦云“入云梦泽中”。于是在孔疏中，“江南之梦”与“云中”（云梦）遂合而为一。而上引今本《左传》杜注于“入云梦泽中”句后，又正有“所谓江南之梦”一句，一直被认为也是杜注，因而与孔疏相得益彰，颇似可以确立了，但事实不然。杨守敬早在八九十年前即曾对“云中”不在今长江以南，作过较精辟的如下论证：

“……《左传》定四年，吴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济江’亦济沔之误。

何以言之？杜注：……云中，谓‘入云梦泽中’，不言在江南北，盖亦知其难言。而后来说《左传》者，因‘济江’之文，不得不谓云中在江南。不知楚昭于云中遇盗，王即奔郢。郢在汉东。若是江南之云中，去郢几二千里，非还济江、溯汉，不能至郢。钟建安能负季半以从？由于又安能‘徐 而从’？则知此‘云中’断不在江南，而在汉东。然则楚昭欲入汉东云中，无济江之理……”。（见《晦明轩稿》，光绪辛丑[1901年]邻苏园自印本，上册，第72页）

这一段论证很有说服力，只有一点未足，就是他也相信“江”是专指长江，但在这里又讲不通，于是只好推断“济江”是“济沔”之误。其实沔水亦可称“江”，所以“济江”也并不错。此外，也应指出：楚王君臣自云中所奔之郢，已不是杜注所云在云杜县境之故郢国所在<sup>③</sup>，而迁到位于汉竟陵县境（在云杜西北）的郢乡。这是史有明文的<sup>④</sup>。竟陵县即使按流行说法，也是在汉水下游；而如按拙作《古竟陵城故址新探》所考，位置就更偏北，当在今钟祥县北境、汉水东岸、丰乐河一带<sup>⑤</sup>。“云中”必近郢，所以《左传》定公四年记楚昭王君臣在云中遇盗时，其待臣王孙由于为保护楚王而为盗所击伤、昏迷，随后仍能“徐 而从”。另一侍臣钟建尚能“负季半（王妹）而从”，则云中自必也在汉水以东的汉晋竟陵县境。楚王“济江”后，即“入于云中”，则所济之“江”，显然也只能是汉水中游、古竟陵县境的某个渡口。这就正好同《左传》定公五年补记的楚昭王君臣出奔时“涉于成臼，蓝尹 涉其孥，不与王舟”的故事，在地理上正相符合。杜注与《水经注·沔水篇》（卷28）皆云成臼在汉水滨、汉晋竟陵县境、白水西南入汉处，即今钟祥县北境的丰乐镇附近，由此往东及往南，皆郢（郢、云）国故地云中所在。蓝尹 所治之楚国蓝县应即《续汉书·郡

国志》荆州南郡“编”县下原注之蓝口聚，亦即隋及唐初郢州竟陵郡之蓝水县（唐太宗贞观元年，并入长寿〔今钟祥〕县）<sup>⑧</sup>。位置大致在成臼对岸（稍偏北）<sup>⑨</sup>。据此，似可肯定：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济江”之处，应即是成臼。济江后所入之云中，以及自云中所述之楚郢公邑，皆未出汉晋之竟陵县境。由郢至随（当在今随州市西之安居镇）<sup>⑩</sup>，直距仅七八十公里，越过不甚险峻的大洪山脉，即可到达。楚昭王“济江”后之行程已明，则济汉江前所涉之睢水，自必也是入汉之水，而不可能是南流入长江的今沮漳河。对此，拙作《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sup>⑪</sup>及《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二文中已有详考<sup>⑫</sup>。前者论证古沮（睢）漳二水实为流经今南漳、宜城县境之蛮河流域，从而位于古沮漳下游之楚郢都及齐梁以前的江陵城就只能在今宜城南境的宜城平原上，而非如孔疏以及后此的流行说法所坚信的、定楚郢都及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在长江边今江陵县境。后一文则考定吴师攻入楚郢都的军行路线乃是自淮西合蔡师向西进军，入南阳盆地，合唐师，转南进，于襄樊附近渡汉水南下入郢。这与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随所经之地不出汉水中游两岸、今宜城、钟祥二县境，正相衔接，而其连接点则为楚郢都。由此亦可定：楚郢都及古睢（沮）水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蛮河下游的宜城平原上。这样，孔疏所谓：“郢都在江北睢东。王走，西涉睢，又南，济江，乃入于云中，知此在江南，……‘江南之梦’，谓此也”的这一论断，遂全失凭借。而上述附在杜预关于睢水源流的注释末尾的那一句“是楚王西走”的注文之非杜注原有，也就随同孔疏的论点一道，迎刃而解了，因为杜预时代（西晋初）的江陵城尚在今宜城县南的蛮河（古睢水）南岸，位于故楚郢都（即汉江陵城，此时改名纪南城）南三十里（当地古里，约合今十里）。故知楚王由郢涉睢，是南行，绝非西走。只有到周、隋时，江陵城已南迁至长江边今江陵县境（沮漳之名也相应地移到今沮漳河南流、过今江陵县西，入长江）的位置之后，人们（例如唐初的孔颖达）才会产生楚王自郢西走涉睢，南济江之说，以及那句“是楚王西走”的伪杜注。杜预久居荆襄，熟习江陵一带情况，又是谨严、笃实的学者，岂能在江陵，南迁长江边以前三百年，就已有此“楚王西走”的地理观念？这是绝不可能的。其实，清代学者江永在所著《春秋左传地名补注》中，已对楚王西走之说，提出非议（见卷11“涉睢”条）。看来，这一条伪杜注，连同上一条说“云中”即“所谓江南之梦”的伪杜注，都同云梦“跨江南北”说一样，是后人（不迟于北宋前期）依据孔疏之说，有意或无意地臆入杜注的。以假乱真的结果（而三者又彼此呼应配套），遂使孔疏的上述有关云梦泽论点，俨然都成为源于杜注，从而提高了权威性，使后人更不敢轻易怀疑了。其实这三条都是鱼目混珠的“续貂”之作。（3）孔疏以“梦”及“云中”皆作“云梦”解，而又可单称“云”，单称“梦”；分在江南、北，合称则为“云梦”，以此作为古云梦跨江说之延伸与旁证。后世因袭此说，流传迄今。其间究是南“云”北“梦”，抑北“云”南“梦”？后人又有分歧，而又皆无确据，只凭推想，各执一辞，莫衷一是。今按：孔疏的这种论辨实皆附会之辞，盖由于未知“梦”作为楚地方言，乃是通名，实为泽薮及水草地之义<sup>⑬</sup>。而“云”则是地名，与郢、邕等互通<sup>⑭</sup>。春秋早期是国名，后灭于楚，为楚郢县（又称“楚郢公邑”）。云中当是古郢（邕、云）国故地之泛称，与后来的汉中、巴中、巫中、黔中、湘中等等之为某一地区泛称，大体相类。郢国地望，据《左传》桓公十一年杜注，在当时江夏郡云杜县东南。《晋书·地理志》（卷15）荆州江夏郡“云杜”县下原注“故云子国”，亦足相证。《尚书·禹贡篇》有“云土梦”。“土”与“杜”古亦相通，前人已有论定<sup>⑮</sup>。《史记·夏本记》（卷2）司马贞（唐初人）《索隐》引韦昭（三国时，吴人）的注解即已指出：“云土今为县”。《索隐》于此后加按语谓：“《汉书·地理志》云：江夏有云杜县”。《水经注·沔水篇》则提得更明确：

“县故邕亭。《左传》‘若敖娶于邕’是也。《禹贡》所谓‘云土梦作义’，故县取名焉。

县有云梦城，城在东北。”

凡此,皆可见先秦时楚之云梦乃在汉东,今钟祥、京山二县境<sup>①</sup>,并不近长江,更谈不到“跨江”,岂能以此证云梦泽“跨江”之说?上引《左传》定公四年孔疏所云:“言‘江南之梦’,则江北亦有‘梦’矣”,更是不合逻辑的推想。“江南”是楚国的一个地区名称。江南地区的梦,称为“江南之梦”,岂能由此推断江北亦必有“梦”?总之,孔疏由于误解“云”与“梦”之涵义而衍生之本条论述,实皆属于臆测。这一先秦时期位于汉东的楚云梦(郢国之梦、云土梦)与“江南之梦”各为不同地区之“梦”,岂可混为一谈,见有“梦”字,便释为同一云梦?

综上所述,似可认为:孔疏之误,实在于其说建基于一些不符史实之前提,与由此引伸的推论,以致未能对《左传》原文作出应有的正确理解,从而对先秦时的楚境地名如“江”、“江南之梦”、“云中”,以及楚国方言中的“梦”,都作了错误的阐释与定位,进而引伸出楚云梦“跨江南北”的错误“创见”。而孔颖达又是唐初奉旨主编《五经正义》(包括《春秋左传正义》与《尚书正义》)的权威学者,其书为后世科举考试必读的经学范本,向为一般士人所遵奉,影响甚广。后世的学者遂据以引伸概括,终于把与杜预《释例》以及其他一系列六朝人的有关记述相矛盾但与孔疏合拍的见解,以简括的字句篡入杜注,起着冒牌货的巨大欺骗作用,从而使孔疏的论点更具有虚假的、以杜注为依托的历史凭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一条伪杜注,曾被后人多方面引用,作为谈论“大云梦泽”的基本依据。而“是楚王西走”及“所谓江南之梦”这二句之篡入真杜注之末尾,又起了与云梦“跨江南北”的伪杜注相呼应,从侧面予以加强,从而起着巩固孔疏错误见解,掩护其“跨江”说权威地位的作用。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古云梦泽的兴衰演变规律,必须依据今存的古代(特别是孔颖达以前的)可靠史料,直探本源,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成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础。杜预正是这一时期的权威学者,他的著作——《集解》与《释例》,是我们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凭借。因此,上述三条鱼目混珠的伪杜注必须认真鉴定,予以辨明,才能消除这一在关键史料上的巨大障碍,从而在去伪存真条件下,走上更坚实的研究道路。

#### 注 释:

- ① 参阅沈括《梦溪笔谈》(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本,1934年版)卷4末,“旧《尚书·禹贡》云:‘云土梦作义’”条。
- ② 参阅蔡述明、官子和《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见《海洋与湖沼》学报第18卷2期(1982年3月版),第129—142页,另请参阅蔡述明《武汉东湖湖泊地质(第四纪)研究——有关东湖成因和古云梦泽问题的讨论》,见《海洋与湖沼》学报,第10卷4期,1979年10月版,第384—394页。
- ③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华容。侯国。云梦泽在南”句下,刘昭(齐梁时人)补注引“杜预曰”,亦转录《春秋释例》此段,而在“或曰:南郡华容县东南”句下,多“亦有云梦”四字,今据补。后文“巴丘湖”前无“有”字。下文作“江南之云梦也”,较《释例》多一“云”字。泉按:本文正文所引《左传》昭公三年所记为“江南之梦”,无“云”字。《水经注》卷32夏水篇“王以田江南之梦句下”即云:“郭景纯言:华容东南,巴丘湖是也”,“梦”前亦无“云”字。孔颖达(唐初人)《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54第434页(总页2136页),定公四年“疏”引《[释例·]土地名》此段,亦无“云”字,则上引《续汉志》刘昭补注中“江南之云梦”中之“云”字,当是衍文。
- ④ 《水经注·夏水篇》所引“杜预云:枝江县、安陆县有云梦”,与正文所引《释例》内容大同小异。两县之前,未言郡属,仅云两县“有云梦”而无“城”字。未知据杜预何书(今本杜注无此条)。
- ⑤ 《尔雅·释地第九·十薮》“楚有云梦”句下,郭璞注云:“今南郡华容县东南,巴丘湖是也。”
- ⑥ 请参阅孔颖达《春秋正义》及《四库全书总目》,皆见《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首;或《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卷26,经部,《春秋类》一,《春秋左传正义》(60卷)提要。
- ⑦ 见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57—73页;或《文史》第六辑(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年 6 月版)第 81—89 页。

- ⑧ 拙作《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对古沮漳二水即今蛮河流域有详考,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211—257 页;或《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年 1、2 期。
- ⑨ 参阅《左传》桓公十一年杜注郟国地望。
- ⑩ 参阅《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江夏郡“竟陵”县下原注。
- ⑪ 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135—146 页,或《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创刊号)。
- ⑫ 参阅《隋书》卷 31 地理志,竟陵郡“蓝水”县条;《旧唐书》卷 39 山南东道,“郢州”序文。
- ⑬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 265 湖北省安陆府古迹“蓝水废县”,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 77 湖广三,钟祥县“蓝水城”条。
- ⑭ 参阅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92—94 页;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1 期,第 63—64 页。另请参阅武汉大学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光镐、王克陵、徐少华《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简报》,见《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第 1—7 页。
- ⑮ 参阅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391—396 页。
- ⑯ 参阅《楚辞·招魂第九》“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句下,王逸(东汉人)注;洪兴祖(南宋人)补注。
- ⑰ 关于“郟”“郚”与“云”彼此可以互通,请参阅《通典》卷 183 州郡十三,安州安陆郡序文“春秋郚子之国”句下原注;及《晋书》卷 15 地理志下,荆州江夏郡“云杜”县原注。
- ⑱ 参阅周寿昌(清人)《汉书注·校补》卷 22 地理志上,“云杜”条;魏源《释云梦》,见《魏源集》(中华全局 1976 年版)第 562 页。
- ⑲ 关于汉晋古云杜县当在今京山县西北境以及先秦时期楚之云梦及其前身春秋初期的郚(郟、云)国附近之梦,与《尚书·禹贡篇》之“云土梦”地望在今京山、钟祥二县间的考释,请参阅石泉《云杜、绿林故址新探》,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156—173 页;或《江汉学报》1961 年第 1 期第 31—37 页,石泉《绿林故址考》。另请参阅石泉《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见湖北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楚文化新探》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版),第 91—101 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